

中國近代
經濟思想史大綱

胡寄窗 著



1662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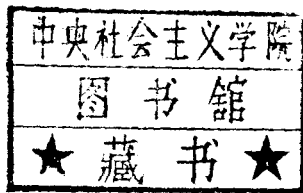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

胡寄窗



200069754

D1511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印张 106千字

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册

统一书号：4190·187 定价：2.80元

序 言

此书是拙著三卷本《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的姊妹篇，故所研究的历史时期的上限起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与三卷本衔接起来。正由于如此，不少鸦片战争时期的思想家如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王茂荫及其他人的经济思想，因三卷本下册已有较详细的论述，本书就只用了一章的篇幅作些概略的分析。历史时期的研究下限断至一九四九年。这样，按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同以后的社会主义时期区别开来。由于目前许多关于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其研究的历史下限多断至五四运动，所以如果本书尚有什么特点的话，这便是它较为特出之处。

我从事本书的编写有一个思想演变过程。在五十年代开始编写三卷本时，并未打算整理鸦片战争以后部分。但在资料搜集过程中给我造成一种印象，即在这一时期，典型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已无新的发展，而新引进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也不够成熟，很难总结出具有理论意义的新经济观点。稍后，又得知高教部已组织力量编写我国的近代经济思想史，更无必要多此一举。三卷本下册的编写工作曾得到高教部文科教材编写处的关注与支持。一九六五年高教部了解到下册即将脱稿，曾通知我按自己的体系继续写到“五四”运动。这种在部定教材之外又鼓励个人著述，以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精神，使我非常感动，于是就把任务接受下来。次年十年动乱开始，近代部分的编写工作陷于停顿。七十年代之初，我的“牛棚”生涯已基本结束，在百无聊赖之余，拟重理旧业。那时以儒法斗争为研究历史线索之声，甚嚣尘上，我的这种不以儒法斗争为线索的著述，只能私下进行，以完此未竟之

志。又因那时图书馆工作已陷于瘫痪，无从查对引文出处，不得不采用笔记方式，于一九七二年写成《中国近代经济思想——1850到1919》一稿，计十几万言。此稿已分别刊载于一九八〇年的《财经研究》和《经济学集刊》。惟在此稿发表之前，我的思想又发生一些变化，设想何不趁此尚有精力之际，将历史下限延展到解放前夕，使旧中国经济思想之研究能依据社会形态的变革作一个完整的总结。于是才开始了本书的编写。

这里，有两点要说明。第一，关于“五四”运动以前部分，第一章基本上是拙著三卷本第十六、十七两章的缩写，其余各章是一九七二年稿本的调整、充实和深化，虽在观点上有不少发展，但其中不少段落是照抄旧作。然而细心的读者可以从这些已改变和未改变的论述中发现著者思想观点的演变。第二，“五四”运动以后部分的编写体系与以前各章大不相同，重点是放在经济科学及其分支学科发展的全貌上，因此，除一部分关于经济思想的直接分析外，较多的是论述关于经济专著的发展演变。当然，经济专著的发展演变必然要体现经济思想的演变，只是不如以个别经济学家为主进行分析较为显明而已。此种体系在国外有名的经济学说史的章节中也不乏先例。但这里并不是模仿外国，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的许多经济学家基本上还处在引进国外各种经济学说的阶段，甚少独立创见。如果我们仍照“五四”运动以前那样，以个别经济学家为体系来编写，那将是对国外经济学教科书内容的复述，人人千篇一律，缺乏新的内容，即使个别经济学家在极个别问题上偶尔有点新见解，也不足以用专章来论述。列宁曾经说过，判断人们的历史功绩，“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①。在经济学说史的总结上也须如此。“五四”运动以后的我国经济科学已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不能再象上世纪后期那样将由国外引进的某些一知半解的西方经济常识也作为新生事物看待。此时期的经济学家们对国外经济学说较系统的传播作

^① 《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用是可以肯定的，但从经济科学的历史发展角度考察，又当别论。这里采取另一种编写体系，将本时期的经济学术之发展作较全面的概括分析，似乎更有其参考意义。

最后，须向中山大学汤照连同志和南开大学陈文华同志表示感谢，因为他们对“五四”运动以后部分资料的搜集曾付出过辛勤劳动。另外，上海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对资料的查阅给予很大方便，在此谨表谢意。

胡 寄 窗

1982年7月10日

绪 论

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中国经济思想发展过程的历史时期，是从鸦片战争到解放前夕这一完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时期。由王学文同志在本世纪三十年代首先指出的^①，已为中国思想界所普遍接受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的特征，对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性质的剖析，具有无可置疑的历史价值。

从社会经济形态方面考察，所谓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必然是传统的旧封建经济体系的日益瓦解和外来的资本帝国主义经济体系的日渐繁殖这两种趋势的交织，换言之，是整个历史时期全属于新旧社会形态的变革或过渡过程。正确掌握这一认识，对本时期的各种思想意识包括对经济思想的分析，是十分重要的。恩格斯曾经指出，各种政治的和思想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并不是按照共同的意志，根据一个共同的计划，甚至不是在某个特定的局限的社会内来创造这个历史”^②。所以，当现实的经济关系还处在变革或过渡过程的时候，各种社会思想意识也会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过渡性质。以本时期的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为例，传统的旧经济观点，它们赖以产生的经济关系已经腐朽并且趋于瓦解，尽管仍有不少人努力予以维护甚至加以宣扬，但他们最多也只能是反复地咀嚼旧的经济教条，提不出什么新的见解。另一方面，新的经济思想由于新的经济关系尚未形成，它们必然是幼稚而不完备的。特别是在我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新的经济思想几

① 见何干之：《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上海生活书店1937年版，第59页。

② 《恩格斯致瓦·博尔吉乌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99页。

乎全是由海外引进的，且不谈其引进方式应否依样画葫芦地照搬问题，也还有一个是否准确照搬问题，至少是不可能对引进的外来经济思想很快地提出新的发展和创见。因为在一个旧经济关系尚未瓦解而新经济关系尚未形成的社会中，骤然引进一种新的思想意识，即使不是格格不入，也应有一个适应和消化的过程。马克思曾经指出，一个学外国语言的人，“只有当他能够不必在心里把外国语言译成本国语言，当他能够忘掉本国语言来运用新语言的时候，他才算领会了新语言的精神，才算是运用自如”^①。学习语言如此，吸收新学识也大致如此。在一个传统思想具有极长久的历史而地域又相当辽阔的国家里，这一过程就需要更长的时期才能结束。总之，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过渡性质，决定着这一历史时期的经济思想基本上只是传统经济观点的反刍和外来经济观点的复述，只是到本时期之末，才有极个别的值得提及的新经济观点的出现。

但是，经济思想史乃至任何思想学说史的任务，在于总结历史上出现过的具有创新意义的观点和学说，而不是把久已存在的旧思想重复叙述。我国自鸦片战争起，古代的光辉经济思想成就^②，已无丝毫的进展可资称述，并在与外来的经济思想的斗争中败下阵来，终于为后者所排挤，变成为足资人们怀系的古旧陈迹。由国外引进的各种经济学说，在那时的确是些新生事物，对旧封建经济的瓦解也起过不少的作用，但它们的内容不外是转述国外久已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的A B C。这种转述在当时既是必要的也是有用的，可是却不能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应予以总结的内容。因为这样做的话，将使这部经济思想史成为国外各类经济学教科书的图书集成，不再是一部思想史了。这种情况是由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过渡经济的特征所决定的。如果某种经济体

①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页。

② 读者如对我国古代经济思想成就有兴趣，可参阅拙著《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光辉成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系由于它自身内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产生一些新经济观点，并在它对旧观点的斗争中最后把旧观点加以排挤，则这些新观点均系可贵的，值得总结。在我国的具体情况下，这些所谓新经济观点，均系由国外引进的久已形成体系的现存理论，就无必要再象前述情况那样一一加以总结。因为它们都不是我们自己的新的创见，何况它们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还未能做到较为准确的转述。

既然如此，那末，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经济思想就不值得研究和整理了吗？那也不然。历史毕竟是历史，有特殊成就的历史是历史，没有成就的历史也是历史。凡是一个历史过程，就应该在相应的历史学科中加以总结，只是在总结的方法和重点上须有所区别。既然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传统的旧经济思想无所发展，而新引进的经济思想又只是其浅显介绍，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①，只“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②，那末，对本时期经济思想的整理和总结，须采取与鸦片战争以前不同的方法，亦即不能也不必要把总结的重点放在若干新的、卓越的经济观点的爬梳上（这样做即使不是徒劳的，至少是得不偿失），应侧重分析各种新旧经济思想的斗争演变过程，旧的如何消灭及何时消灭，新的如何发展传播及其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传播情况。既然所谓新经济思想不是内生的而是由外部注入的，我们就无法把它们作为自有的创见来对待，只能考察其传播程度与影响。所以，只能把这个过渡时期看作是为我国在未来经济思想领域内的“起飞”而服务的“创造前提阶段”。尽管在本时期内的经济思想并无特殊创见，但对未来的“起飞”却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考察，我们现在的研究还是颇有意义的。

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1页。

② 《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8页。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时期，中华民族在思想意识领域经历了两次亘古未有的变动。

首先是鸦片战争。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英国的大炮”毫无疑问的是推动中国一八四〇年以来无数次起义的原因^①。英国帝国主义炮舰不仅粉碎了清代封建王朝的武装力量和冲破了天朝闭关自守的经济大门，也在思想意识领域引起了第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变化。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曾不止一次地被落后民族或邻国所击败乃至被征服，但中国人民不曾有一次被胜利者或征服者所鄙视，也不曾有一次丧失其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只有鸦片战争的失败才使民族的自豪感也同时被侵略者的炮舰所摧毁，民族的自信心也开始动摇了。人们对传统的思想意识及社会价值产生的怀疑日渐增长。先进的人们决心从他们的侵略者的武库里寻求物质的和精神的武器，开始了一个无先例的“向西方学习”的运动。这在鸦片战争以前是不能设想的。以往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从东方的印度学习佛教。但这次向外学习是统治阶级在某些政治因素的支持下潜移默化地进行的，既不曾失去民族自信心，也不是一种广泛学习运动。向一贯被称为“夷”的西方学习，毕竟对那时的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难于接受的痛苦过程。就一些死抱着传统思想教条不放的顽固分子而言，他们拒绝接受这种学习就更不用提了。即使在许多先进的人们中间，其思想深处的矛盾苦痛也都不小。他们迫不得已只好捏造一些说法，如西方的文明与科技本来就是“来自东土”或者是“模仿先王”的旧法而发展起来的，所以学习西方不过是把中国之故物又还之东土而已。这种自我陶醉的谬说既为了麻醉别人，也为了欺骗自己。这一谬说以不同形式讲了将近六十年，在“戊戌”以前的先进思想家中间几乎没有例外。这也表明鸦片战争在我国人民思想意识中所引起的震动是何等的大。

第二次思想意识领域的变动是“五四”运动，它的影响又是极

^①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10页。

为巨大而深远的。它所导致的思想变革比鸦片战争所导致的还要彻底。鸦片战争虽使人们对传统的思想意识和社会价值产生日益增长的怀疑，但尚未把它们彻底抛弃。那时先进的人们向西方学习，是为了学“夷技”以“制夷”，继而是在不损害固有礼教的条件下吸取西方文明，到十九世纪之末汇总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总而言之，始终还有某种固有的道德准则不能放弃，有时还用它来作为采择西学的标尺。“五四”运动的第一炮就是“打倒孔家店”，彻底摧毁了旧有的一切道德准则，要求以一些新的价值准则和科学方法为起步，处理现实的各种问题。后来有的人甚至宣扬“全盘欧化论”。所以，“五四”运动在思想意识领域中所引起的波澜壮阔的变革，才是最为彻底的。

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所经历的这两次巨大的思想变革，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它们一次比一次地更加开阔了人们的思想境界，为中华民族未来的光辉文化成就的出现创造了前提条件。从消极方面看，也显示了一个幅员广大、文化悠久的国家、思想意识变革的漫长的难产过程，在经济思想领域也是如此。大体说来，整个时期均处在引进各种外来经济学说的由浅入深的学习过程，何况在对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尚未充分掌握的时候，又开始了一个学习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新的征程，其接受和消化的过程的延长，更是意中事。

也应指出，半封建半殖民地化虽是一个总的演变过程，但二者的发展进度却非完全一致。半封建化比半殖民地化的演变过程要慢得多。紧接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封建反动统治集团以屈服于西方殖民主义者能为事，一切政治和经济活动日益仰承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鼻息行事。尽管他们这一时期是投靠这个帝国主义而另一时期又投靠另一帝国主义，总而言之，都是看国际帝国主义的脸色行事，不敢稍事违抗，这样，很快就形成了半殖民地状态。但是，半封建化的发展形成过程就不完全如此。中国封建经济占支配地位的时期长达二千多年，它的支

配地区又相当的辽阔，再加上政治上层建筑的反动力相当雄厚和封建思想意识的力量相当牢固，这就决定着向半封建经济的转化过程不得不更为延缓。在鸦片战争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广大的地区特别是广大的农村仍然受封建的自然经济的支配。只有极少数沿海城市才有资本主义企业的创立。这些企业有不少是官营的，既是官营的就必然成为官僚们的贪墨地盘而难望其有较快的发展。如系私营企业，它们一方面要受封建官僚机构的压榨，另一方面还得受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摧残。这种摧残是为了阻止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以免其既丧失所掠夺到的地盘又增加一个竞争者。所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在国民经济中一直只占极小的比重，并经常是在风雨飘摇的环境中挣扎前进。资本主义因素之缓慢前进，也就是封建经济的延缓瓦解。这种情况到辛亥革命以后才有所改变，严格地说，半封建化经济到此时才正式形成。

上述基本经济形势决定着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经济思想的发展可划分为两大阶段，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前夕和从“五四”运动到解放前夕两大阶段。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夕这一大段时期，经济思想的发展又可再分为两个小阶段：前者包括十九世纪后半期，后者从本世纪之初到“五四”运动。

十九世纪后半期的经济思想表现了以下的特征。第一，在西方经济思想的传播领域日益扩展的同时，仍经常遭受着传统的旧经济思想的顽强抵抗。所以，此时的经济思想方面的斗争代表着封建主义的旧经济思想和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思想之间斗争。第二，那些倾慕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传播者们也不时运用中国型的旧经济观点和术语，乃至“先王”、“圣道”等等牌号来装饰自己。他们有不少的人可能是真诚地相信这种中西合璧才是完善的，也有不少的人可能是如马克思所说的“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①。第三，迷信或盲目贩卖西

^①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121页。

方资本主义经济那一套的买办式思想有相当广泛的市场。就连一些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才积极传播资本主义经济常识的先进人物也不例外，只是在程度上各有深浅而已。

具体地说，“向西方学习”在经济方面就是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知识，包括一般经济常识与经济学。那时介绍西方经济知识的不外两类人，一类是曾经到过西方的中国人，一类是在华传教士。前一类大部分是清廷驻外使馆人员和七十年代起派往国外的留学生及个别赴国外旅游的人。他们大多引进些肤浅的资本主义经济常识，只有留学生马建忠与严复才真正研究过资产阶级经济学，但是马建忠从未系统地介绍资产阶级经济学说，而严复的有名译著《原富》到了一九〇二年才问世。此外，还有一些人如魏源、洪仁玕、冯桂芬、郑观应以及一些戊戌变法时期的代表人物，他们仅是从译著或上海、港澳等近代都市吸收一些资本主义经济的感性知识。后一类除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外，也包括少数海关行政机构的外籍官员。他们别有用心地大量宣扬资本主义经济知识并在八十年代由人代笔译出了几部西方经济学著作^①。这几部经济学译著可算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原理在我国传播的嚆矢，但由于译者削足适履地搬用许多传统的经济概念和术语，弄得内容不中不西，未能明确地揭示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从而在读者心目中只起到一般经济论著的作用。总之，在这个时候所引进的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常识，未深入到理论领域。这时的

^① 此时的西方经济学译著据查到的有三部：

第一部：《富国策》译自英人H. Fawcett（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也曾提到他，说他是“博爱”的经济学者。）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于1867年在同文馆任教习后不久即以此书为教材，命名为《富国策》，后来由汪凤藻仍以《富国策》之名译成中文，出版于1880年。

第二部：《富国养民策》译自英人W. S. Jevons的《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系由海关总税务司译成中文，出版于1886年。

第三部：《保富述要》，原著者英人布来德，译本无原著者之英人名及书名，故从略。由英国传教士付兰雅（John Fryer）口述，徐家宝笔译。共17章，系一本货币银行学原著，译本出版于1889年。

引进具有两个特点，第一是传统的封建主义的旧经济思想与引进的资本主义新经济思想之间的斗争，直到十九世纪之末均未停止，只是传统的经济教条在前期仍占优势，后来才日益削弱，而资本主义经济知识的传播情势则与此相反。第二是此时所传播的均为西方尤其是英美的经济知识，甚至所译的经济学著作均系英国经济学家的原著。这主要由于那时的日本刚经过明治维新不久，正忙于引进西方科技知识，在社会科学方面尚无显著成就，因此从日本无从引进。同时，传教士多来自欧美，尤以英、美为较多，而那时英国的经济学尚在欧美各国中居于极优势的地位，故多译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原著。

从一九〇〇年到“五四”运动前夕这二十年中，资产阶级经济学传播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首先是传统的旧经济思想的维护者在前一世纪之末的斗争中败下阵来，从此中国古典的经济思想自本世纪之初起已不再具有现实的意义与作用，只被人们作为足资怀念的祖国古代文化成就来研究。于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独霸了经济讲坛。其次是这一时期大量地引进了有美国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原理及其分支学科的著作。可以说，如果本世纪以前的国内学者所宣扬的均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知识的话，则此时所传播的才算是资产阶级的各经济学科的系统理论，例如第一部古典经济学的名著译本《原富》就是一九〇二年才刊行的。又一个特殊情况是，西方经济学的译本与前期比较在绝对量上虽有所增加，而译自日文的经济学科的经济著作大大地超过西文译本。这是由于自甲午之役以后国人对日本的想法起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本世纪初以来不断有留学生负笈东洋，而那时的东京又成了变法失败分子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避难所。特别是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七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保皇派在东京开展的一场大论战中，双方均力求在资产阶级经济学武库中寻找加强自己论点的理论武器。这场大论战无形中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国内的传播起了极大的积极

作用^①。辛亥革命以后，各地纷纷设立大专学校，进一步巩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独霸阵地。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优势地位，随着“五四”运动波澜壮阔之展开，更加强其支配势力。以往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传播，由于还有

① 这里附带阐述一下“经济学”这个名称在我国使用的大致经过：

在本世纪以前，“经济”这个辞是“经世济民”的缩语，被用来表达一个人处理政治要务的才能，从来不作它的现代意义的理解。日本明治维新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对西文Economy这个辞没有适当的译文，即借中文“经济”二字作译文，于是出现了“经济学”这一专用名词。有人说这个中文译名原来是中国人首先使用，后来才被日人所借用，但未举出确凿证据。不论怎样，反正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经济学”久已成为约定俗成的专用术语。我国在1880年翻译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命名为《富国策》，这是中文的最早译名。1886年的另一部经济学原著译本命名为《富国养民策》。大抵在1890年前后，《富国策》这个中译名是比较流行的，例如著名的殖民主义分子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于1894年还用《富国策》这个译名来代表亚当·斯密的著作，陈炽于1896年又借用《富国策》这个名词称他的著作《续富国策》，1898年丁韪良担任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时仍用他在同文馆时所用的《富国策》之名。大抵此时又有人译为《理财学》，故严复在1901年为其译著《原富》所写的译事例言中不同意日人《经济学》及国人《理财学》的译名，主张译为《计学》。1903年日人杉荣三郎被聘为京师大学堂教习，接替丁韪良之职，编写一部《经济学讲义》，由京师大学堂出版，这是在中国出现的第一次以经济学命名的书。但是在同年的京师大学堂的课程中仍以《理财学》为科名，并有杨廷栋著的《理财学教科书》出版。但又有不少的人别定译名，于是有《富国学》、《生计学》、《货殖学》及其他等等名称的出现。而一些译自日文或以日文为蓝本的著作大都沿用日本译名《经济学》或《经济纲要》、《经济通论》等等。国人自撰的有1905年王璟芳著《经济学》，1907年李佐庭著《经济学》，均以日文原著为蓝本。总之，此时各种译名都有，五花八门，莫衷一是。1906年有王宰善译的《经济学教科书》，但不知它译自哪国文字，可算是国人使用《经济学》译名的第一部译著，同年有奚若译自英文的《计学教科书》，仍未用经济学命名。比较确定的是1908年宋宝铎译自S. M. McVane的《经济学原论》（Workinge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这是很明确使用经济学名称翻译西文经济原著。自此以后《经济学》名称的使用日益普遍，以1910年熊崇煦、章勤士合译自R. T. Ely的《经济学概论》（Outlines of Economics），风行一时，曾发行十余版之多。辛亥以后，经济学的译名更加普遍，只有极少的人仍使用其他名称，例如梁启超虽主张用《生计学》译名，但他在东京与资产阶级革命派论战时也常使用“经济”一词，后来更常用“经济学”这一名称，可是在辛亥以后，有时也偶尔使用《生计学》一词。陈焕章在1913年还用《孔门理财学》名称翻译他的英文名著。孙中山先生虽极同意采用《经济学》一名并经常使用，但在1920年前后也曾偶尔使用“生计之学”说法。可以说，在辛亥革命前夕，《经济学》这一专用名词大致已成广泛使用的术语，其他译名已不共多见。辛亥之后，随着各高校留日归来的教师日多，《经济学》之名更日益成为约定俗成的术语，只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有时使用其他名称。

在着封建意识的一定局限，即使在它已获得绝对优势的时期，人们也多少存在着一些不得已而为之之感。“五四”运动的爆发彻底摧毁了旧的封建意识，采取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式的科学研究方法。从此，在各种学术思想的研究上，无论整理古旧的或阐述新生的，均以此为起点，从头开始。此时人们对西方经济思想的引进，已不再有所顾忌而视为理所当然。至于能否准确无误的引进，那是另一问题。

然而好梦不长，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又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并伴随着“五四”运动的开展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迅速地扩大其影响。事实上，科学的和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早在本世纪之初就已经有所传播了。伟大的《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已不时有人点滴介绍，不过介绍者本人却不一定相信甚至有的还反对马克思主义。至于形形色色的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无政府主义在辛亥革命前就曾有不少信奉者广为宣扬，不过在辛亥以后无政府主义就逐渐销声匿迹。“五四”运动中涌现出许多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这才真正开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学习与传播，在此后三十年中继续艰苦坚持，迄未中断。

因此，中国经济思想之发展在这一阶段也有以下一些特征。首先是这一阶段内的经济思想领域的斗争，已不再是中国传统的旧经济思想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斗争，而是在新的客观形势下转变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之间的斗争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久已夺得了支配地位并有其广泛市场，为了替它所代表的阶级服务，必然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进行攻击或抵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虽然在那时的中国是新生事物，具有无比旺盛的生命力，但毕竟还处在引进和学习的初级阶段，而且还须遭受政治上的压力，当然不易很快地达到被充分掌握和运用的水平。但是，这三十年的学习与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成绩，决不亚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在过去八十年所取得的成绩。二者的斗争一直持续到解放前夕，只是其斗争采取或明或暗

的形式。其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传播已由以往主要靠翻译国外原著的情况发展到以国人自撰著作为主而传播的阶段。相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则基本上仍处在以翻译为主的阶段。最后，在翻译著作中，资产阶级经济学则由“五四”以前主要从日本引进改变为主要由西方特别是由英、美引进。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本时期之末，译自西文的著作日益增多，译自日文的著作几乎绝迹。另一方面，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译著基本上均来自日文原著。所以，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及以前，中国人民不仅由日本输入了大量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及其各种分支学科，而且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一开始也主要是由日本引进的，自二十年代之末起才逐渐由译自俄文原著的经济著述所代替。

我们所探讨的历史时期的经济思想发展的总情况，决定着我们的研究不能不采取不同的方式来阐述。十九世纪后半期的经济思想，除已停滞不前的中国传统的旧经济观点毋庸赘述外，由西方新引进来的绝大多数是些资本主义经济的常识，罕有深入到理论水平的观点，自无一一作理论总结之必要。但由于学者们所传播的资本主义经济知识各有其侧重点，故我们仍采用以各个思想家为序列的编写体系。本世纪初，虽已有大量经济理论方面的专著问世，但由于它们不是译著便是转述东西方经济基础理论而无所发展，故无必要一一予以复述，除极少数特殊情况外，我们将采取概括方式以表述其经济思想传播过程的全貌。

关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时期的经济思想，我们将分为三大部分来论述。第一部分包括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到甲午之役前夕的经济思想，总的说来是“向西方学习”的初级阶段。第二部分是从甲午之役到“五四”运动前夕，这一时期，主要论述戊戌变法前后的经济思想中维新派的重要经济观点、本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重要经济观点及两派的大论战。第三部分是从“五四”运动到大陆解放前夕的经济思想的发展概况，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传播和斗争为主要线索。